

青年王陽明

(1472—1509)

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ming's Youth

行动中的儒家思想

杜维明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青年王陽明

行於中而端於外

沈德明著

ISBN 7-309-04111-1

——

青年王阳明

(1472—1509)

行动中的儒家思想

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ming's Youth

杜维明 著 朱志方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年王阳明：1472—1509：行动中的儒家思想 / (美) 杜维明著；
朱志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0
(三联精选)
ISBN 978-7-108-06073-0

I. ①青… II. ①杜… ②朱… III. ①王守仁 (1472—1528) —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 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5462 号

特邀编辑 孙晓林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鲁明静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 数 155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献给我的父母

前 言

王阳明是儒学传统中最活跃的思想家之一，对一代又一代东亚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6世纪到17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在日本，阳明的学说叫作阳明学，有中江藤树（1608—1648）、熊泽蕃山（1619—1691）、佐久间象山（1811—1864）等杰出的思想家进行解说，被看作日本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阳明思想的声音在当代中国和日本仍然有着清澈的回响：孙中山（1866—1925）的行动学说、熊十力（1885—1968）的心灵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更不用说1970年震撼文学界的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的事件，都多少受了阳明思想方式的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阳明思想的力量来自他的哲学洞察和个性的动态性质。在有生之年，他吸引了数百名学生，有农夫、商人、乡绅，也有仕人（包括太守、御史和有名望的学者）。他们有的来自长江三角洲一带阳明的故乡，有的来自广东、湖广、江西等遥远的地区。阳明提出著名的致良知（innate knowledge）的学说。这种学说是从他的知行合一论衍生出来的，这样他就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他重视立志的重要性，主张通过修身（self-cultivation）

对典籍作切身的理解比读书更重要。他本人重身教而不只是言教，为这种新学说提供了一个示范。在他的影响之下，孔孟之道不再被看作是只有读书人才能走的路。孔孟之道成了一切人的道路，其初衷就是如此。可以毫不勉强地说，在这个特定的方面，阳明对儒学所作贡献同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作的贡献一样深刻。

阳明对儒学的改进，还表现在他能够唤起人们的决心和坚决的行动（sincere purpose and firm action）。担任知县、刑部主事、兵部尚书和都御史的官场经历，使他直接面对宫廷政治的现实，并对公共事务（public service）有充分的经验。这些都给他这位身心合一的导师的毕生事业增添了新的维度。他既有思想创新，又能把新观念创造性地应用到军事谋略、社会组织、地方政府的治理上。在这两个方面都闪耀着灿烂光芒的儒学宗师，中国历史上惟有王阳明一人。确实，在明朝中期，他在前线平息匪患取得辉煌的成功，他巧妙地捕获一名最残暴的叛军的首领，为他赢得了明朝最卓越的学者—将军的声誉。毫无疑问，对阳明思想的全面理解，必须包括对明朝中期社会的了解。我们将看到，尤其是在叙述并力求准确地表达他的哲学的第一次尝试时，这种了解是必须的。

16世纪初的中国称为明朝中期。那时，上层日益残暴的统治和下层与日俱增的不满严重威胁着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夹在其中的学者—官员，敏锐地感觉到步步逼近的危机。危机的标志是宦官专权、任人唯亲和深重的社会不安全

感。个人对科举仕进的传统要求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因为参与竞争的合格考生的数量有实质性的增长，而录取的名额却非常有限，因此年轻学子们很容易为道家或佛家式的生活方式所吸引。阳明、他的同代人，还有那些受儒家概念体系影响的人，都看到了这个问题。不是把这个问题看作自我与社会的冲突，而是看作做人的斗争（a struggle to be human）。这必定涉及自我和社会两个方面。他们问：你是否能够忠实于你的人身位置（personal locus）。这个人身位置被看作一个关系中心，而不是一个处在各种剥去人格特征的力量中间、可以孤立开来的个体。经过研究，我相信，阳明在思想成长的年代始终关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寻求用儒学概念体系来定义的内圣（sagehood）。因此，这项研究的一个主题是考察阳明所说的“内圣”是什么意思。关心这问题会使某些人感到奇怪，他们熟读儒学的教本解释，熟知这些教本特别强调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他们似乎对追求内在自我的完善没有兴趣。的确，西方许多解释中国历史的人有这样的印象：传统中国典型的儒家是读书做官，他们的主要社会作用是帮助政府维护法律和秩序。由于儒家通过建立世界的和谐关系来达成这个目标，所以他们优先考虑使用劝说而不是压制进行文治和教育。结果，儒家缠身于官场琐事，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精神追求的范围，大多变成了务实的政府官员。当然，儒家也可以有天才的艺术家、创新的诗人或精神领袖，但是，他们在总体上扮演着社会和政治因素规定的角色。这使他们的其他活动处于边缘地带。

而且，常常有人推想，追求内圣就是寻求内在自由。他们认为，这种追求必然意味着断然抛弃既定的社会规范。虽然社会要求人们坚守对它的空洞的顺从，但个人为了自我实现，一定会摆脱强加给他的僵硬的规范。这条推理依赖于这样一个信念：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自我实现一定是持续地反抗社会压迫。从这种视点看问题，就很难理解一个缠身于政治事务的学者—官员如何能够同时真心地追求内圣。

另一个同样令人困扰的困难产生于一个普通的假定：由于内圣指一种通过反思和内省获得的智慧，所以它基本上与沉思的生活方式相联系。所以，儒家睿哲的大众形象是，他不仅有德有智，而且年纪很老。因此，把这样一个概念用到阳明这样的青年活动家身上似乎有点不寻常。不论你如何发挥你的想象力，你很难看到获得内圣与一个追求仕进的学者—官员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在明朝中期的中国，儒家说教无疑是社会中最有力的思想力量，出现儒家将军和思想家，同出现儒家官吏和文人一样，并不奇怪。于是，问题似乎就出在我们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把内圣看作静态的人格理想。我们很难看到，内圣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自我改造过程。这里的问题不只在于内圣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还在于如何获得它，因为内圣的意义只能依照人们追求它的方式来阐述。

实际上，从儒学的概念体系来看，内圣既不是不可达到的目标，也不是抽象的规范、求上进的标准。内圣之道是

一个取向，指导儒家做人，从而使他置身其中的世界也能够被人性化。因此，这个道（the Way）总是要在关涉人性的场景中去寻求。它使儒家能够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有时鞭策他们这样做。然而，由于内圣主要是一个伦理—宗教的理想，它建立在一组价值之上。这些价值明显不同于通常被理解为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的东西，追求内圣往往导致他们与现有的社会政治秩序产生紧张和冲突。所以，必须走社会之路，即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精神上的自我界定必定与现有的价值体系相矛盾。

同样，虽然儒家的内圣蕴涵着深刻的自我认识，这意味着坚持不懈地追求内在自由，但这种内圣之道绝不离开人类世界。儒家没有类似于基督教教堂或佛教寺庙的精神庙堂。死后的生活、超自然的存在和超越的实在等观念，对于他们的终极关怀来说只是边缘。的确，一个真正的儒家绝不会成为一名隐士，因为追求人格的本性与他们投身于社会的意向是不可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把内圣看作人生在世的最真切、最诚实的表现。因此，对于儒家，内在自由与社会参与的二分并不显现为有意义的取舍。寻求人生道路时，必须把这二者看作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借用赫尔伯特·芬加勒特（Herbert Fingarette）的话说，“入世为圣”是儒家学说的最重要的特征。因此，走向内圣之路并不是退回到冥思的生存方式，而是一个贯穿生命始终的动态的自我改造过程。

把追求内圣当作一个动态的自我改造过程，这无疑有

着深远的心理学含义。虽然我们可以在心理学的框架内描述和解释青年王阳明的人生经历，但是他如何创造性地处理他受到的心理压力这一问题，在这里只是作为背景谈到。这项研究致力于阐明两个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阳明在形成自己的自我规定（self-definition）的过程中不断地挖掘思想资源，另一方面是他通过自己对这些资源的利用，重新塑造了他所继承的那种思想的某些既定模式。因此，可以说，这项研究就是要分析在阳明寻求内圣的过程中，他的思想的初步结晶。

本书假定读者已经非常了解明代思想史的基本线索，也了解王阳明的生平和思想。然而，由于本书所讨论的是儒学传统中一些持久争论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我的著作对研究亚洲思想和比较宗教的学者也有所裨益。1972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亚洲研究学会的年度会议期间，大会组织了一次专门的会议，纪念王阳明诞辰五百周年。同年6月，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在夏威夷大学举行。会议赞助举办了一个国际研讨班，也是为了纪念他。此后，在王阳明生平和思想的方面，有为数不少的解释性新作首次以英文形式出现。我希望这本书对这一方兴未艾的学术有所贡献。

致 谢

在我对儒学思想做一般研究和对王阳明做具体研究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徐复观教授、牟宗三教授和唐君毅教授三位诲人不倦的老师近二十年的长期指导。他们现在都是香港新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日本京都的西谷启治教授、九州的冈田武彦教授帮助我理解阳明的精神追求，是亚洲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陈荣捷教授在中国哲学方面所做的开拓性的工作，对于研究明代思想的学子是莫大的鼓舞。他阅读了全稿，并在许多实质性的问题上给我提出了慷慨无私的建议。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教授数年来领导了美国新儒学研究的发展。由于他的精心安排，我得以同国内外的专家们进行交谈，这些交流使我受益匪浅。

我要感谢下面四位学者，他们以不同方式指导了我早年的王阳明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就是向哈佛大学提交的一篇博士论文（1968）：贝拉（Robert N. Bellah）教授和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教授的研究生课程，使我了解到王阳明的个性的宗教和心理因素；我的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和杨联陞（Yang Lien-sheng）教授，在我写作前两稿时给了我精心的指导。我还要感谢普林

斯顿大学的刘子建 (James T. C. Liu) 教授和牟复礼 (F. M. Mote) 教授, 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我对王阳明做博士后研究时, 他们给我提供的许多建议是一针见血的。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 我同我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同事和朋友有过长期讨论, 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要特别感谢加斯帕里 (Gerard Caspary)、陈启云 (Ch'en Ch'i-yun)、余佐翰 (John Ewell)、雪纳 (Irwin Scheiner)、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他们提出了深刻的意见和建设性的批评。我感谢奥康内尔太太 (Grace O'connell), 我交给出版社的文稿是她帮我打印的。我要特别感谢维克兰 (Paige Wickland), 她不辞辛劳, 仔细校阅了排印稿。我还要感谢在我的研究的关键阶段给了我善意的支持的四个单位: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人文科学委员会、美国学会理事会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我还要感谢两家出版社准许我引用它们的版权资料: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准许我摘录陈荣捷注译的《王阳明的传习录和其他新儒学著作》(*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by Wang Yang-ming*, 1964),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准许摘录《易经》德译本 (Richard Wilhelm [卫礼贤] 译) 的英文翻译本 (Cary F. Baynes 译)。

目 录

前 言 1

致 谢 1

导 言 1

第一章 探 寻 17

一 家世和出生 17

二 才华出众的诗人和关心社会的文士 29

三 军事谋略和政务 41

四 道士和儒家圣贤 56

第二章 抉 择 72

一 阳明洞里的生存选择 72

二 禅宗佛学与家庭亲情 84

三 道家与曾点精神 97

四 儒学和山东之行 106

五 北京定终身 117

第三章 大悟 127

- 一 同刘瑾作斗争 127
- 二 赴龙场途中 141
- 三 大悟 158
- 四 人际关系的新层面 172
- 五 修身的结构 181

第四章 意义 194

- 一 知行合一观 194
- 二 陆象山的影响 201
- 三 朱熹难题 207
- 四 格物之争 215
- 五 主体性原则 220
- 六 知行合一的含义 227

出版后记 235

导 言

大约五百年前，王阳明阐述了“知行合一”观。在新儒学思想的领域里，人们做了大量的努力来阐明这个学说的含义。可以理解，多数解释所反映的特殊关注，都远离阳明提出这个见解时的基本思想方向。许多人试图把知行合一与阳明人生经历联系起来，但其中很少有人费心去探讨阳明精神追求的“内心感受”（inner sensibility）是什么。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陈荣捷教授，他在一系列注释性的翻译和专题研究工作中，系统地探讨了阳明的思想经历。他的开拓性工作，为进一步研究阳明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另一项用英语作出的独创性贡献，是倪德卫（David Shepherd Nivison）的论文《王阳明以来中国思想中的知行问题》。在这篇论文中，知行合一的观念被看作是中国学术传统中的一个持久问题。^①

相比之下，我的目标并不大。我既不打算对阳明思想

^① 倪德卫：《王阳明以来中国思想中的知行问题》，载《中国思想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芮沃寿（Arthur F. Wright）编，芝加哥，1953，112—145页。

走向成熟的岁月做全面的阐述，也不打算对知行合一做系统的分析。我要做的是弄清这位青年的内心感受，从而确认一个伟大思想的来源。这位青年的个人奋斗，几百年前实际上已经成了整个儒学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样一种认定，要求细心考察王阳明的经历和明代历史两个方面。因此，这项研究既要考察王阳明所关心的学术问题，也要考察青年王阳明的较难辨明的影响。他生活在明代社会中，而这一点在我看来对知行合一论的产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当然，要研究王阳明，就要研究中国思想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我而言，这也就是要探究他的经历和学说的动态机制。这不仅是令人难忘的往事，而且是生生不息的儒学传统中的一个持久问题的具体表现。我相信，王阳明事件表现了两个方面之间的一种辩证发展：一方面是持续不断地以自觉（self-awareness）为指导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产生于经验探求（experiential search）的治学方法。从一个角度看，阳明的经历表现了一种真诚的努力，想实现一种人格理想，超越社会和历史的限制。从另一个角度看，阳明的学说似乎反映了个人在一个特殊的时空接合点上的内心斗争。有人把他推崇为孔孟之道的见证人，也有人把他对自我实现的追求看作离经叛道。我的意见是，阳明的人生给我们的启示可以推广成一个普遍的观念。他的学说传达了一种直接感觉（sense of immediacy），这必须根据他的特殊的人生处境来评价。

我的一个基本假定是，阳明的学说既不是从个人的内心经验抽象出来的一组思辨观念，也不是一种思想训练的形